



三迤读书事 书香彩云南

马丽娜 杜娟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中华民族自古提倡阅读,在古今书籍经典中,劝学尚读成为重要话题。如劝人勤读不辍的荀子《劝学篇》写道:“锲而舍之,朽木不折”;如传授读书方法的宋儒陆九渊《读书》道:“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又如赞颂读书之乐的唐人翁承赞《书斋漫兴》写道:“人家不必论贫富,惟有读书声最佳”;再如,强调善读需用心体会的清代学者徐洪钧在《书怀》诗中写道:“中夜每独坐,耿耿灯火聚。到眼初茫然,思力未能赴。朗吟一再过,旨趣或流露。回环三复余,延缘得津路。”读书需要经过一番吟诵,才能知道书的大意,连续朗读三遍以上,便能明白书中道理。总之,从少儿总角到及笄青壮,从弱冠之时到耄耋垂暮,不可一日不读书。云南虽山脉逶迤,但三迤大地自古也回荡着琅琅读书声,翠湖经正书院、安宁云峰山馆、陆良钟灵书院、大理写韵楼、开远状元馆、丽江木府万卷楼,一座座书舍学馆聆听着云南文人读书以致用、读书为家国、读书以为乐的故事。

翠楼同写韵 读书以致用

“夫儒者之学,在乎明体以致用”,历代文人大多主张读书的根本在于实际运用,“六经之旨以合于世用”,明朝著名文人杨慎提出“圣贤师弟子亦不苟同”“文章宜经世致用”。

杨慎,明代文学家,字用修,号升庵。少时好学,“奋志读书,不出户外”。《明史·杨慎传》记载:“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称杨慎博学鸿文,是古来著述最富第一人。嘉靖三年(1524年),杨慎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被流放云南,他在云南近30年间,博览群书,著书达400余种。在云南期间,与滇云文人李元阳、杨士云、张含、胡廷禄、唐铎等人“日与交游倡和”饱览胜景,诗文酬唱,读书问道,留下了不少美谈。

嘉靖九年(1530年),杨慎与李元阳游点

苍山。李元阳是明代著名文学家,云南大理人,两人唱和诗文、钟情山水,交往十分密切。二人在苍山深处寻访古迹,于风景绝美中饮酒作诗,晚间投宿通感寺。“暮投感通寺楼,篝灯夜坐,闻寺僧诵经多讹音。”其间听到寺庙中的僧侣诵经时偶尔会有一些字读错音。于是李元阳建议杨慎撰写一本书,以矫正宋人在古音韵观点上的弊端。杨慎听从了李中溪的建议,“余遂操笔,书转注之例约千余字,汇为一编”即为《转注古音略》。杨慎在著述《转注古音略》时,强调要联系时代实际,矫正一味崇古的学风,“读书应引证颇博,学而致用”。书稿完成后,李元阳将杨升庵著书立说的地方题名为“写韵楼”,并将书稿刊刻,广为流传。

当时的转注写韵,一定程度上类似于现在的注音读字,这对于诵书读韵多带乡音的云南人而言,是一件规范语音的重要事项。对于读书治学要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的做法,李元阳还在《送升庵先生还蠡川客寓诗序》中补充道:“先生旧尝读书点苍山中,著《转注古音》,以补字学之缺。一时问字者皆摩山麓。先生今日复至,则曩昔问字之士,皆崭然露头角为闻人矣。识者谓先生所至,人皆熏其德。”可见,杨慎主导的致用学风,在滇云文人的不断参与下,共同营造出了读书以致用的浓厚氛围。

致敬惟桑梓 读书为家国

儒家之学,不仅强调“明体致用”,更是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读书治学的道德理想,家国情怀成为每一个读书人的情感归宿和最热烈的精神底色,为家国而读书的故事也被不断传扬。

熊庆来,字迪之,云南弥勒人,杰出的教育家。中国近代数学研究与高等数学教育的奠基者之一,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从小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家国情怀对他的读书求学治学之

路产生着重要影响。

熊庆来出生在弥勒县息宰村(今弥勒市庆来村),他7岁入村中私塾,接受儒学教育,13岁时,随父亲赴任赵州(今大理凤仪)儒学训导,受教于庄从礼、赵凤韶两位新派老师,初步学习了法语和数学,开始接触到自然科学基础知识。1907年,熊庆来考入云南省方言学堂。1908年,方言学堂改为云南省高等学堂。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10月30日,昆明重九起义,推翻了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为选拔人才,云南省高等学堂设英文专修科,准备用公费送学员到外国留学,熊庆来考取英文专修科法文班。1913年,熊庆来考取云南官费留学名额,这一年云南共送出24名官费留学生。抱着关心中国社会、关心中华民族的情緒,熊庆来踏上了赴欧学习西方科学知识,以科学救国的道路。

熊庆来一行抵达法国马赛,便一头扑在学业上。他在给父母亲的家信中写道:“靡念祖国危亡,云南尤盼,要励志向学,勿浪掷分寸光阴,务以造就有用之学,回来报效祖国。”熊庆来在法国留学8年,先后就读过格罗诺布大学、巴黎大学、蒙彼利埃大学、马赛大学等4所大学,共取得了高等数学、高等微积分学、理论力学、理论天文学、高等物理等5个高等学历证书,获得法国理科硕士学位,同时更坚定了他“科学救国”的思想与信念。1920年11月,熊庆来返回祖国,随后在东南大学、清华大学任教。

1937年6月,熊庆来受时任云南省主席龙云的邀请从北平启程南下,就任省立云南大学校长,兼任理学院院长。“七七事变”后,知识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当此非常时期,“宜全民武装,以谋抗战”,再无暇顾及教育、学术的发展。熊庆来却一直主张“科学救国”“教育救国”,认为即使在大敌当前、国难当头的非常时期,知识分子也应该用发展教育、发展科学、发展学术的行动来拯救自己的国家。他撰写了题为《抗战中后方对于学

术建设之责任》的文章,于1937年12月5日发表在《云南日报》头版。“共图延续我国学术之生命,而树立我民族复兴之基础。”熊秉衡在《父亲熊庆来》一书中回忆说:“在那里办大学,别的不说,单延聘教授一端便十分困难。但是云南是他的故乡,他觉得对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青年有一种责任,所以终于决定‘为桑梓服务’,回去了。”

山水好作伴 读书以为乐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其所指应该把读书学习作为一种追求、一种爱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到好学力学。无论是读书以致用,还是读书为家国,都应该从读书中收获快乐。乐读乐学,不仅是因为读书学习可以增长知识,更是因为读书带来的“山水之乐”“田园之乐”“修身之乐”。

云南“山川明秀,民物阜昌,冬不祁寒,夏不酷暑,山川环绕,川泽泓泓”,云花、云果、云滋味、云风、云南、彩云南,为历代云南读书人提供了争奇斗艳、形态各异的客观世界,也为乐学乐读搭建了旖旎想象、多彩繁复的地理空间。因此,云南诞生了许多记录读书以为乐的歌赋文章。

赵士麟,号玉峰,河阳(今澄江)人,清代名宦。其在《读书堂全集》中撰写了一篇《读书赋》回忆童年时父亲传道授业的场景:“予童时,先大人教以进德先后之序,为学次第之方,详且善矣。十九龄来,奉以黾勉。今不幸弃麟逝矣!余恐其久而莫之循也,用著为赋,以志不忘云。”随后赵士麟发出感叹:“读书可以立德,可以立言、可以立功,为孝子、为悌弟、为忠臣,此名教之乐。然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皆取法山水。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已志。忘怀得失,自此以终……人莫乐于闲,非无所事事之谓也。闲则读书,闲则能游名胜,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饮酒,闲则能著书。天下之乐,孰大于是?”字里行间都体现出追求“孔颜之乐”

的精神境界。

戴纲孙,号筠帆,昆明人,清嘉道年间云南著名文人,其诗、文俱佳。在他的《咏雪斋文钞》中有一篇《筇竹寺读书记》,读之引人入胜,欲罢不能。“今则寺以筇称,案隘借榻一窺之地,振衣千仞之罔,远隔嚣尘,薄舒幽抱。于时,岁在乙酉,始春迄,斋钟晓起,山色横窗,梵音盈耳,泉声到枕。象踪峰歌之畔,闻以琴书,谓之飘飘然。寺楼东畔有牡丹一株,色正红。每花开时朵之大有如盘者……睡起挑灯,对影明月,开怀好风曲唱谁家,好书乐读矣。”好一幅寄情山水,读书作伴以为乐的读书行乐图跃然呈现。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当代散文家。1939年至1946年在云南学习生活,回忆在西南联大的读书生活,汪曾祺写道:“联大学生课外时间多消磨在大小茶馆里,干什么的都有,聊天、看书、写文章。有一位教授在茶馆这个喧闹场所读高深莫测的梵文;还有一位姓陆的研究生连漱洗用具都放在一家茶馆里,每天起床后就来到茶馆洗脸刷牙。而我每天课后,就带着两三本书和钢笔、稿纸,与朱德熙等一起上附近的文林街泡茶馆,一边喝茶,一边吃‘花生西施’的五香花生米。最初的几篇小说是坐在钱局街的一家老式茶馆里写出来的。”这样闲适悠然的读书生活,一方面与汪先生以读书为乐的心境有关,另一方面也许与昆明人淳朴的民风有关。汪曾祺还描写到,若园巷房东院里有一棵很大的缅桂花树,花开之时,“香出巷外”,房东老太太靠卖花贴补家用,但她却毫不吝啬,清晨摘花时常常先送一盘缅桂花给租房的穷学生们。缅桂花的香极了昆明人的性格,不浓烈也不急躁,温柔地熨帖着每一个行路人。

又要到缅桂花开花的时节了,伴着这温润的花香,正适合开卷缓读,读一篇三迤故事、吟一首彩云诗赋,过一种有书香的云南生活。

(作者分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文献研究所副研究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到丽江的百年院落里读书去

本报记者 苏宇箫 吴清泉

读书,是最生“灵气”之事。袅袅书香润人心,更聚一座城市的灵气。在神秘瑰丽的玉龙雪山下,形如一方砚台的丽江古城就是被文化滋养百年的地方。雪山秉正气,书院养浩然。7.279平方公里的古城,坐落着30个大大小小的文化院落,它们承载着前人勤耕好学的精神,也寄托着后者对文化传承发展的期望。

丽江自古以来文风鼎盛,木府外一座牌坊上的“天雨流芳”四字,便是最直观的体现。这是纳西音译语,意为“去读书吧”。纳西族的教育渊源可上溯至元朝末年,明代木氏土司倡导纳西族学习汉文化,清康熙年间,孔子六十六

代孙孔兴询来丽江任通判,兴办学府,百姓得以读书,更广泛地组织学习和传播汉文化。雍正元年(1723年),丽江“改土归流”,流官大兴汉学,修书院,建学馆,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陶冶,民间受到了较为深刻的影响,“读书明礼”逐渐成为丽江人的家风家教。

几百年过去,今天丽江古城中的琅琅书声似乎被商业的喧闹所掩盖,快餐式旅游让这座原本意蕴深厚的城市略显浮躁,不少来丽江文化寻根的旅客,对四方街和古镇过于浓重的商业颇有微词,认为这座文化遗产古城的内涵被淡化和忽略。商业开发与保护传承如何互补共生?文化和旅游两个产业如何深度融合?成为

城市管理者们需要努力解答的时代命题。

丽江古城管理有限公司民族文化产业分公司副经理苏凤告诉记者,为了保持文化遗产的完整性和原真性,提升古城历史价值和内涵,同时又满足大众对旅游的新需求,2016年起,丽江古城保护管理局开始尝试与丽江市纳西文化传习协会等机构合作,采取特许经营的方式,引入具有社会责任感 and 研发能力的文创企业,运用新理念来设计改造传统庭院,增添新功能,赋予新内容,产生了一批提升型的文化院落。

我们刻意避开夜晚的喧嚣,起个大早,晒

着清晨的暖阳走进古城,顺着蜿蜒静谧的小巷,寻访那些沉淀百年后又展现新颜的书香庭院。

走进古城五一街王家巷巷公房37号,这里是清末纳西族接受汉文化教育的重要场所——雪山书院。这座办学历史长达180年的书院,是清朝“改土归流”后,丽江首任流官杨黼和丽江府儒学教授万咸燕于清雍正三年(1725年)共同创办用来普及汉文化的官方教育机构。书院的东屋、西屋及北厢的楹柱上都镌刻着由文化名家题书的楹联,厦子空间及陈书室内悬挂着丽江清代进士人物介绍、到访书院的国内外学者名家照片,以及各种东巴及汉文的字画。雪山书院工作人员和晓兰向记者介绍了书院的前世今生,慷慨地带我们到二楼参观了珍藏的各种拓片。和晓兰说,经历了多次的修葺、扩张和改建后,现在的雪山书院已经成为集藏书、读书、教书、写书、出书功能于一体的文化传承空间,开设了影响力较广的“丽江讲坛”,再结合培训讲座、办展览、著书立作等形式多样的实践,日益成为丽江古城文化传承与思想交流的“镇城之院”。

靠近古城中心的十月文学馆,与雪山书院有些不同。这是一座典型纳西民居风格的建筑,建于1921年,是由李氏家族的家祠修缮改造而成,门楣上的“十月文学馆”五个字由著名作家贾平凹题写。这里的内饰装修风格清新现代,有展厅、书坊、沙龙、笔会等功能区域,偶有早起闲逛的游客到此,可以就着这份清静,坐

下来读一本好书。据介绍,十月文学馆是北京出版集团旗下“十月”文学品牌在国内设立的首个文学展馆,也是丽江古城第一个以文学为主题的特色文化院落。馆内现有藏书3000余册,均为“十月作家”的文学作品,每年,“十月作家”们也会到这里住上一阵,寻找创作灵感。

在王丕震纪念馆,记者又发现这里有一些新的“玩法”——丽江古城沉浸式实景互动体验一日游“偷时间的人”。游客扫码参与游戏,换上一身古装,化身剧中人,前往多个古城的代表景点,与实景互动,进行解谜推理。这种以“文化+历史+游戏+旅游”的全新模式,让老城文化与流行游戏碰撞出了新的火花。

诸如此千姿百态、各有特色的文化院落还有很多。如顾彼得旧居、红军长征过丽江指挥部纪念馆等名人故居与历史事件类的纪念馆,如三联韬奋书店等书斋书店书院,又如东巴象形文字绘画体验馆、如天地院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体验场所等。丽江打造的文化院落以主题特色、服务功能,到资源整合范围、技术运用等,都在不断拓展,丰富多彩的传统文正在以全新的形式呈现在大众面前。

很显然,丽江想通过这些院落,把文化安驻在古城的深处。用一座城来涵养文化水源,又用文化的活水流来滋养一座城的气质,以兹共振出古城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2024年是云南省实施文化和旅游强省建设三年行动的第二年,全省各地正在积极行动,推陈出新抓热点抢流量。文化院落为丽江的文旅融合提供了良性共振的空间载体,探索的步伐已经迈开,让文化院落长久健康地发展,才能满足新时代文旅融合的要求。如何让文化院落找到流量密码,成为体现古城文化张力的打卡点新网红,可能还要在优化机制、搭建平台、整合资源的基础上,加强市场调研,重视配套服务,推进衍生产品开发,拓宽推广渠道。同时,瞄准目标对象,以更切合年轻人的方式找到互联网的多样化表达,让文化院落成为丽江的新IP,释放出助推丽江文旅产业的力量。



十月文学馆。本报记者 苏宇箫 摄